

暮年漫谈（节选）

○费孝通（1935 届研）

编者按 2020年是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。费孝通（1910—2005），江苏吴江人。中国社会学、人类学和民族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。一生以书生自任，笔耕不辍；而且学以致用，知行合一，致力于探寻适合中国文化与社会传统的现代化之路。本文节选费孝通先生93岁高龄时亲撰的《暮年漫谈》（刊发于《群言》，2005年第5期），讲述的是1928—1944年期间先生的求学经历，特别是在燕京、清华和海外求学及归国后在云南从事社会学研究的经历，以作纪念。

1928年，我从东吴大学附中毕业，直接升入东吴大学，这中间曾经报考南洋大学，但是没考上。当时大学生普遍都想毕业后出国留学，不然就觉得低人一等。对我来讲这种出国留学的愿望更加强烈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说起来也是年轻人争强好胜。小的时候，由于我家的经济条件比外祖父家差，我们几个兄弟心里不服气，暗地里跟几个舅舅比赛，不管在哪方面都想要超过他们。几个舅舅天分都很高，学习成绩很好，我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有舅舅在出国留学了，我当然不能落后，暗下决心一定要出国留学，不能落在舅舅后边。

在20世纪初，像我这样家里没有条件送出国留学的人，有几条路可走。一条是考官费。记得当时清华每年会在报上登出公告，写明这一年有哪些学科招考官费留学生，要考哪几门功课等等，一般一科只

招收一个人，各校拔尖的学生都会报名，考上了就像中状元一样。据我所知人类学只招收过一次，是许烺光考上了。我二哥费青，也是考上清华大学公费留学资格，到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法律。

另一条路是争取国外大学的助学金，这需要有教授推荐。那时国内的普通大学与国外联系比较少，所以推荐的机会也少；然而教会大学由于与国外的联系多，推荐学生的机会就多。有的学生为了得到推荐的机会就多方设法托关系、走门路，甚至巴结老师。那时最好的教会学校是圣约翰大学，第二是南洋大学。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都能讲一口地道的英语；东吴大学就差一点，我们讲的是“苏州味”的英文。

还有就是毕业后留校当助教，先工作几年后再出去。林耀华走的就是这条路。

我在东吴大学上二年级的时候，碰到了“五卅”运动。我是学生会的干部，跟



一九三六年，费孝通在清华

□ 名师轶事

大家一起上街游行。恰巧这时医务室的一个校医与某学生发生口角，动手打了这个学生，在处理过程中，学校当局明显偏袒校医，学生们很不满意，事情越闹越大，整个校园闹起来，学生们开会声讨、罢课抗议。事情平息后，校方要开除带头闹事的学生，我是其中的一个，后来因为大多数老师认为我的功课好、品行也不错，就没有开除我，但是东吴大学是不能要我了，责令我转学。这样我就到了燕京大学。

那时候燕京大学允许新入学的学生，先听课再选择专业，可以挑选先生，我就将各个系主任讲的课听了一遍。记得我听了比较有名的、教心理学的陆志伟先生的课，也听了社会学系主任许世濂的课，最后我选定了社会学系。

在社会学系我认识了吴文藻老师。我知道他是我小时候就崇拜的冰心女士的丈夫，所以从心里就认定他一定是个“不凡”的人才。后来逐渐加深了了解，吴文藻老师的确是与众不同。比如燕京的一些老师都用英文给学生上课，甚至国文课都用英文来讲，有的老师还给自己起个英文名字。但是吴文藻不这样，他用中文给我们讲课，记得他曾经用中文给我们讲解一本英文写的西方社会思想史。用中文讲英文教本，实际上就是现场“口头翻译”；吴文藻也不给自己起外国名字，后来他更提出“社会学本土化”的口号。这是吴老师的特点，有中国味，我是很赞成的。

大学毕业出国留学，是当时大学生梦寐以求的。要出国就得有老师推荐，我就跟定了吴文藻老师。我从燕京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去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的机会，但是与我同时毕业的还有杨庆堃，为了不跟好朋友竞争，我放弃了这个机会，听从

吴文藻老师的安排，报考清华研究院。其实吴老师有一个大计划，他想经过司徒雷登的同意，把英国牛津大学的导师制引进到燕京，为了实施这一计划，他在哈佛大学成立100周年的聚会上，同当时社会学界的领头人、英国的马林诺斯基教授接上了头，马氏同意了吴老师的设想。可惜后来因为爆发了抗日战争，这个事情没有成功。

为了“社会学本土化”，吴老师千方百计想通过各种渠道把他选中的学生送到国外学习，培养中国自己的社会学人才，谁去哪里，跟哪位老师学习，怎么出去，他心里都有数，他想通过清华送我去英国师从马林诺斯基。

那时，燕京校园里学术空气活跃，在社会科学圈子里，一些学历史学的人成立了“神州国光社”，用马列主义观点讲中国社会史，那时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两种思想斗得厉害，双方论战激烈。他们的争论引起我很大兴趣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些争论加强了我对研究中国问题的决心。在双方论战的人当中我最佩服的是顾颉刚，他写的《古史辨》我都认真读过；他用民俗资料来印证历史和他的历史地理学都影响过我，1933年我的毕业论文《亲迎婚俗之研究》，就是以地方志为根据，观察结婚时新郎要不要去迎接新娘这样一种民间风俗的地理分布，来看文化的变迁的。

1935年从清华研究院毕业，经过一年准备，我终于踏上去英国留学的道路。

1938年，抗日烽火已燃遍中国大地。我从英国辗转回到昆明，便立即加入吴文藻老师组建的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“实地调查工作站”，下乡搞实地调查研究。

1940年冬，由于日军飞机的轰炸，在昆明城里跑警报的次数越来越多，“实地

调查工作站”不得不疏散到城外去。搬到什么地方去呢？经吴文藻的介绍，我们选定了呈贡县古城村外的魁星阁。魁星是“主宰文章兴衰的神”。这座破败的三层古庙的外面风景很美，内部却陈旧不堪，地板踩上去嘎吱作响，墙缝里藏着小虫，叮得人浑身发痒。我们把一层做了厨房，自己开伙；二楼摆上桌子办公；三楼住人。张之毅、田汝康、谷苞、史国衡等几个人就在这里安顿下来，虽然条件简陋、生活艰苦，但大家情绪很高。后来大家都把这里叫做“魁阁”。

我没有住到魁阁，因为那时候我的妻子快要生孩子了。按当地民间习俗，不是当地的人是不能把孩子生在这里的，我们不得不住到呈贡县城一个姓李的保长家里。我们住的房间下面是猪圈，真是别有一股气味。不久孩子就降生了。

魁阁的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，我在魁阁算什么角色呢？可以说是个“小头头”或“大服务员”吧。在这里工作的人都不是在读的学生，他们是联大或清华的毕业生，是助教待遇；我在这里也不正式开课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不满意老的那套讲课方法——先生讲学生听。我就学马林诺斯基老师的“席明纳”那套，用讨论的办法，由学生依照自己的兴趣提出问题，想出研究的路子，然后下到实际中去观察、调查，各人做各人的题目；过一段时间再集中起来，大家一起谈感受、念论文，我谈我的看法，他们讲他们的道理，互相争论、共同研究，无拘无束。我们研究的范围很广，比如张之毅跟我搞农村调查，田汝康到一家国营机器厂调查女工情况，谷苞研究地方社区、村子的行政系统……

我们出去搞调查是打着云南大学的牌



青年费孝通在魁阁

子，通过县、乡政府下去，靠了行政系统还是行得通的。当同学们选定题目，确定调查点以后，我就去跟有关单位接头，向他们讲清楚调查的内容、调查的目的、有什么意义和商量一些细节。同时我们还尽量利用一些私人关系来打开局面。田汝康去机器厂调查，就利用了跟厂里管事的人相熟，住到厂里去，能够接触到女工，后来写了《内地女工》的调查报告。我去禄村也是靠了私人的关系。那时候我刚从英国回到昆明，人地生疏，去哪儿搞调查一时还没着落。这时候我在街上偶遇在昆明工作的燕京同学王武科，他的老家在禄丰，而且是个“大户人家”，他知道我的情况后，带我去了禄丰，介绍我住到他亲戚家，这家人信奉基督教。说来也巧，我的一个信基督教的姨母杨季威这时正在这里传教，村里人都知道她，凭着同学的亲戚和姨母的关系，我很快被当地老百姓接纳，他们愿意跟我谈心、讲真话，这对调查工作大有帮助。后来张之毅参加进来，我带着他串门调查，同农民打交道，让他知道怎么根据实际情况提出问题等。事实上我在魁阁只带了张之毅一个人。

如果说在禄村我是靠私人关系打开了

□ 名师轶事

局面，那么易村这个调查点则是在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，仅仅和当地政府接洽一番后就贸然闯了进去。这个地方离昆明约150公里，只有一段路通汽车，剩下的路程只能骑在运货的马背上前进，这段路整整走了6天。这次旅行已经过去了60多年，然而当年旅途上的情景还历历在目。一天马帮在滇池边寨子里过夜，没地方住，我和张之毅就在一座破店的菩萨脚下搭个铺位睡下，月亮慢慢爬上屋顶，透过残垣颓壁洒在菩萨身上，四周一片寂静，望着幽幽的月光，真是别有一番情趣。我还记得，在一所村子里的小学校借宿，清晨告辞时，两位素不相识的女教师，硬要塞给我们十几个鸡蛋，说是带了路上吃。

易村是一个很少有外地人进入的偏僻小山村，我们一个人都不认识，却要硬生生地打进去。初到那里，村里安排我们住到一所无人居住、颇为宽敞的房子里，我对张之毅说，这里面一定有“道理”，后来一打听，原来这是一间经常闹鬼的“鬼屋”，没人敢住，所以借给我们，我们就住在鬼屋里开始工作。起初老百姓不知道我们来干什么，自然是不欢迎，甚至生出我们会妨碍他们生活的传言。我们就和村民拉家常，不断地向村民解释来这里的目的，说明不会影响他们的生计。那时我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讲课，不能在易村久留，十多天后就回昆明了，留下张之毅一个人。经过他的努力，终于完成了《易村手工业》的调查报告。易村之后，我们又开辟了玉村的调查基地。

我的这套做法吸引了一批同学参加进来，在魁阁形成了一支大约有十几个人的小小的研究队伍，并且搞出了一批研究成果。除了张之毅的《易村手工业》《玉村

土地与商业》《洱村小农经济》，还有史国衡的《昆厂劳工》《个旧矿工》；谷苞的《化城镇的基层政权》；田汝康的《芒市边民的摆》《内地女工》；胡庆钧的《呈贡基层权力结构》等。当时物质条件很差，为了在魁阁的刊物上发表这些文章，我们就自己刻蜡版，用油印机印刷，此外还准备了一部分英文材料。因为我们的工作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，这时许烺光来我们这里看过，太平洋学会的人也来了；还来了一些外国人，李约瑟是其中的一个，他对我们的评价还挺高；费正清（Fairbank）夫妇参观时看得很细，回国后为魁阁做了不少宣传，以至于魁阁在国外的名声比在国内响，有点“墙内开花墙外香”的劲头。后来太平洋学会出版了我们的一本书。这些事情促使了我能够作为云南大学教授，被派到美国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。

这段时间里我一面讲课，一面写文章，还要自己动手刻蜡版、印刷、出“小报”，虽然整天忙忙碌碌，却劲道十足。

1944年我从美国访问回来，想继续在魁阁搞学术研究，但是，国内时局更加动荡了，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，昆明的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，终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“李闻事件”。我也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，被迫于1946年底远赴英伦暂避。延续了6年的魁阁也在这样的局面里收场了，这个收场好像是个没有“结束”的结束。

经过了八年抗战和三年伟大的解放战争，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。我和全国人民一样也开始了新的生活，努力争取做到自己的步子能够合上时代的节拍，这样又过了半个多世纪。这是后话。